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

讨论会论文（第四版）

（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云南省委党校 李国玮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这两个基本点概括了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基本内容，揭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对于提高我们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这条路线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帮助我们有效地克服和排除来自“左”或右的影响与干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从头脑里冒出来的。这条路线及其两个基本点的形成和提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在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再认识的成果；是我们党对经过八年实践的检验，十亿人民都身受实惠的成功经验的总结。这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它所具有的完整内涵和有机构成，决定了它所包含的两个基本点必然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

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首先是一个内涵完整的整体。其完整性就体现在这条路线是由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既不能互相取代更不可互相舍弃的两个基本点所构成。换言之，这条完整的路线内在地包含着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点。偏废任何一个基本点，将都是对这条路线的一种阉割。只讲一点，不讲另一点；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都不符合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都不可能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这条完整的路线。

从逻辑上看，既然是两个基本点，当然首先要承认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不是完全等同的。否则，就没有必要规定为两个基本点。如果这两个基本点能互相取代，或者就是一个东西，那么归结为一个基本点也就可以了。所以，只有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楚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懂得为什么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才能说明为什么两个基本点是缺一不可的。

我们知道，“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重要思想，是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明确提出的，并对此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着重指出了以下两点：

第一，“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第二，“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邓小平文选》第150页，第151页）

可以说，这两点是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作的高度概括的规定性说明。这一明确的规定性既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又坚持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四项基本原则中关键和核心的是两条，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八年来我们党始终强调的是，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八年来人民从建设和改革的亲身实践中深切体会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8页，第151页）历史早已雄辩地证明，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天的现实同样正在证明，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繁荣昌盛，人民才能富裕幸福。如果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前提，那就是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丢掉了四化的灵魂；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也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因此我们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治国的政治基础，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思想保证。动摇和放弃这一政治基础和思想保证，中国将会出现历史的倒退，人民将会重吃动乱的苦头。

然而，要使这一政治基础和思想保证充满生命力，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总结历史经验，面对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未来，打破过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左”的、僵化的、陈旧的观念。为此，邓小平同志又深刻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2页)于是，现实和未来又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任务：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全面改革。

关于实行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已写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公报中：“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对坚持改革的规定性说明。八年来的实践检验已无可辩驳地证明，“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1页)事实也充分证明，如果农村不改革，城市不改革，对外闭关锁国，对内把城乡经济搞得死死的，那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乡人民就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的实惠，我们国家也就无法达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确实是十亿人心所向，中国前途所系；是振兴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区别就在于：①“改革，包括开放、搞活，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新贡献、新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提出了改革，提出了对外开放和对

内搞活。”②“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红旗》第十四期第5页）一个是建国以来我们一贯坚持的，一个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新贡献、新内容；一个是指导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一个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二者显然不能互相取代、互相等同。正确认识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区别，是全面地、准确地理解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完整涵义的前提，是避免片面性和动摇性的认识保证。偏废或否认任何一个基本点，客观上都是对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的阉割和歪曲，是对我们党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贬低和否定。

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其内含的两个基本点必然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对于它们之间如何互相联系，为什么缺一不可，邓小平同志曾作过如下的阐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0～121页）

“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为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6～117页）

邓小平同志的以上阐述，深刻地揭示了两个基本点互相联系的内在根据，即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而改革乃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坚定地走改革之路。正是这种内在的联系，使得两个基本点自洽地统一在三中全会以来的这条完整路线之中；正是这种缺一不可的关系，深刻说明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什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为什么这条路线会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和如此高的成功率。

因此，我认为正确分析两个基本点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关系，是深刻理解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的钥匙。

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包容，

两个基本点有机统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借用系统论的术语，就是具有一种“有机构成”。这种有机构成的主要标志，就是构成这条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既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又相互包容、彼此制约。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有机地统一于这条路线之中。

要全面地深刻地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必然性，就必须先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两个基本点是在什么前提下提出的。毛主席说过“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5页）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突破。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意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2～53页）事实已经证明，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是正确解决这

个问题的先导。理论一经彻底，就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成为行动的指南。过去，我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封闭的、固定的模式，并且给它附加了许多所谓特征或判定标准。这些附加的东西严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堵塞了社会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道路。今天，当我们谈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一定不可忘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以及妨碍我们摆脱贫困的僵化体制决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应当表现为能较迅速地摆脱贫困和不发达，实现小康和现代化。为此，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舍此没有其他道路，舍此便不能成功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所以，任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背离改革、开放、搞活这个总方针总政策的“左”的或右的倾向，都必然妨碍我们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甚至会造成倒退和动乱，都必须坚决反对。最近，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然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这段发人深省的话，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的坚持和发展，它本身就蕴含着对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客观必然性的深刻说明。因为要真正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离开了任何一个基本点都是无法实现的。

再从实践的方面来看，八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使我们

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就必须牢牢掌握两个基本点。实践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促使改革、开放、搞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才能为改革、开放、搞活提供一个稳定而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样，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才能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那客观上只会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大忙，使四项基本原则受到怀疑和动摇。可见，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统一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与我们每个部门、每个单位的工作成败休戚相关的实践问题。

从方法论和历史观的角度去把握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还必须研究另一个方面，即二者既相互包容，又彼此制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摆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根据这一方法论原则，我们必须看到，四项基本原则固然是我们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但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又重新明确提出，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新的“时空背景”。我们都清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通过拨乱反正，完成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在进入另一场深刻的革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提出的，这

就必然使四项基本原则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即赋予了保证和促进改革、开放、搞活的崭新使命和新鲜活力。事实上，在今天的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包含着既要反对用“左”的、僵化的、陈旧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因而对改革、开放、搞活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又要反对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去理解改革、开放、搞活，因而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坚持后者，是坚持前者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前者，也就内在的包含着坚持后者。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并不在于追求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是解决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矛盾。恩格斯也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应当确认它是处于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所以，唯物史观认为，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身，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征。只有坚持改革，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永葆青春，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显现其优越性，才能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贫困和愚昧，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改革是继推倒“三座大山”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革命。正是把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作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才体现了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新贡献、新内容，才谈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我们同样必须看到，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改革、开放、搞活，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

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它的优越性。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当然是坚持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也就内在地包含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者，既然两个基本点是如此相互依存、相互包容，那么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实际上也是相互制约、彼此促进的。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必然制约着改革的性质、方向和目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又必然制约着四个坚持的实践条件、方式和成效。这种积极的制约，实质上是两个基本点相辅相成的纽带，是推动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把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的动力。那种在认识上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反右，把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看作是反“左”，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那种在实践中搞“兵分两路”，各吹各打，各行其是的做法，是有害的，最终也是行不通的。导致这种现象的认识根源，就在于没有真正懂得两个基本点确实是既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又彼此制约、彼此促进的，所以不自觉地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为“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页，第399页）形而上学的思维特征之一，就是往往在绝对不相容的两极中思考问题。他们要么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异，只承认抽象的僵化的同一；要么否认事物内部的联系，把差异作为绝对对立的根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我们就可以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错误和苦恼。我们承认两个基本点是有区别的，但正是这种并非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

区别，使得两个基本点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又相互依存、彼此包容，由此达到了真实的、具体的、有机的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的客观基础，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

至于那种把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看作是“纲和目的关系”、比喻为“天平的两端”之所以是错误的，根本的就在于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背离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本身。在认识上它是僵化和形而上学的反映，在政治上则会导致贬低和否定改革，我们理所当然要反对。

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牢牢掌握两个基本点，把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能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

坚持《实践论》发展
《实践论》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黄凤久
1987年8月6日

坚持《实践论》发展

《实践论》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黄凤久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已发表五十周年了。半个世纪来，它们经受住了各种社会实践的考验，历史证明“两论”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它们是我党思想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指导我们党获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因此，“两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辉体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两论”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也面临如何坚持和发展的问題。“两论”原本是姐妹篇或上下篇，从根本上说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当前，坚持和发展“两论”既面临大好形势，也遇到了新问题。因篇幅所限，本文只简要谈谈坚持《实践论》和发展《实践论》有关的问题。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纲领性文件，它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任何对这一光辉著作的怀疑和动摇都是不对的，应予以纠正。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之一，就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强调认识的基础是实践。人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得到解决。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都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实现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自己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认识论思想。《实践论》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观点，全面地、深刻地、纲领性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进一步地强调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2—123页）这是因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发展的动力、真理的标准和目的；它全面地阐明了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及相互关系；它创造性地论述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它揭示了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尤为重要的是，《实践论》是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纠正为害我党多年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树立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和发展是多方面的。特别

是它对认识过程辩证法的全面透彻的阐述。对人类认识根本规律的精辟概括，都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发表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它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依然正确。它今天和今后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纲领性文献。

但是，近年来《实践论》却受到国内外少数哲学家不正当的误解、挑剔和指责，这是必须予以澄清和反驳的。

有的论者，借口“两论”从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接受某些概念和思想，就否认“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自己的发挥和创造。这是误解，是形式主义的观点。要知道，“两论”是在长征刚刚结束后写作的，当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数量少，质量也不高，中国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步不久，著述很少，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写作“两论”时参考苏联少数已翻译成中文的哲学教科书，学习和借鉴其中的一些概念和思想，把它们当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中介，这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情。但由此就说

“两论”没有自己的贡献，甚至说是“因袭”教科书的观点，就是误解，甚而是歪曲。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两论”的理论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它们同时是“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长期斗争经验的思想结晶。“两论”写作时，我党已成立十六年，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又进入新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正在步入壮